

## 试论“王朔现象”

高 文 军

中国的当代文学，发展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半期，似乎进入了一个十分微妙的阶段。文学观念的新旧嬗替，文学创作的起伏消长，既在这里集中汇聚，又从这里悄然延伸。孤行者的寂寞与成功者的得意，合奏出此时中国文坛上的强烈不和谐音。自从有人提出“文学：失却轰动效应以后”<sup>1</sup>，大部分人已无可奈何地接受了这一事实。可是“失却轰动效应说”提出不到一年，有一个人的创作，却以人们意想不到的形式，引起一种新的轰动。这个人，就是曾经名不见经传的北京青年作家王朔。

王朔创作带给人们的，不仅仅是纯文学意义上的成败得失。由于他的创作，微妙地涉及到当今改革变化中的中国社会许多敏感的方面，并且他是以一种对几十年来统治人们思想的正统道德规范的挑战态度出现于文坛，因此，对王朔的评价，必然涉及对现实与过去的再认识。还有一点较为重要的是，这一切发生在八、九十年代，中国社会的社会转型期这一背景上。老路仿佛已经走到尽头，未来却又无人能够指点迷津。在“摸着石头过河”<sup>2</sup>的总体社会心态下，任何一种富有挑战性的行为，也许都不失其建设性意义。在这种情况下，起码可以说，王朔的创作是一个契机，它使人们从多角度、多层次认识许多习以为常的事成为可能。

王朔的创作引起轰动效应，形成所谓“王朔现象”，大约是1988年末前后的事。几年来，“王朔现象”曾风靡了文坛，亦引起评论界众说纷纭。有人已不单纯从文学的角度，而是从文化建构的意义上，将其视为一种代表性倾向，来评价它的建设或破坏性价值。<sup>3</sup>结论如何姑且不论，重视王朔的创作在当今文坛上的代表性意义，却是许多评论家的共识。

时至今日，“王朔现象”引起的“王朔热”已有所降温，冷静、客观地对其做一回顾，并对其中一些有趣之处有所发现，不仅有可能也有必要，本文试图从“王

朔现象”入手，对关于“王朔现象”的诸多评论做一大略浏览。通过浏览，不仅可以了解人们如何评价王朔，亦可以从看出评论界的认识方法与思维定势。在此基础上，对造成“王朔现象”的诸多因素做出自己的粗浅的分析，

## 第一章、“王朔现象”的产生

### 一、王朔和他的创作

王朔是80年代中期才开始在文坛崭露头角的一位青年作家。他1958年生于北京的一个军队干部之家。小学2年级，便时逢文化大革命。1976年中学毕业，与大部分军队干部子女一样，参军入伍，在北海舰队服役4年。1980年退伍，到北京医药公司当职员。1983年辞职，成为从事文学创作的“个体户”。

王朔初期的创作，用他自己的话概括：“一路是侃，一路是言情。”<sup>4</sup>

他较早一些有影响的作品，从《空中小姐》（《当代》1984年第2期），《浮出海面》（《当代》1985年第6期），到《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啄木鸟》1986年第2期）以及《橡皮人》（《青年文学》1986年第11、12期），基本上属于“言情”类。

王朔的“言情”小说，应该说是很有特色的。他摆脱了有些爱情小说的“直、露、浅、白”和酸腐腔调，表现得较为成熟而含蓄，因而颇受人们欢迎。他的这一类小说，有几个较为明显的特点。一是男女主人公身份存在较大差异，如年青漂亮的空中小姐和无所事事的退伍老兵油子（《空中小姐》）；舞蹈学校刚毕业的女演员和待业青年（《浮出海面》）；女大学生和流氓团伙成员（《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解放军女军官和走私集团的“倒爷”（《橡皮人》）……。二是作者往往通过男主人公在爱情上的成功或失败，对这些人物的内心世界做较深刻的揭示与展现。三是在这类小说中，作者独特的长于言情和俏皮、调侃的叙事风格已形成并日趋成熟。

从中篇小说《顽主》（《收获》1987年第6期）起，王朔开始了他另一路的创作——“侃”，主要作品还有《玩儿的就是心跳》（1989年作家出版社），《千万别把我当人》（《钟山》1989年第4、5、6期）等。在这一类作品中，王朔以幽默、调侃的态度，集中揭示了“顽主”式的人物在精神上与世俗社会存在着尖锐对立，并对他们的内心世界展开了较充分开掘；而他不加节制、胡编乱侃、玩弄噱头的特点，在这类作品中也发展到极端。

代表王朔创作风格转变的，应当是发表于《收获》1991年第2期的长篇小说《我是你爸爸》。小说一反以往轻松调侃的态度，以沉重的笔调，写出一个中年类知识分子马林生的人生困境与种种窘迫。他在灰暗的现实中内外交困，早已忘记了自己要让儿子一生幸福的誓言。在与日趋成熟的儿子发生几次冲突后，他忽然决定要和儿子马锐建立平等的“互相尊重又互相关心同志式的”父子关系。“然而这场心血来潮的试验，终于因为社会环境和传统思想的压力，尤其是因为马林生的多疑、狭窄和自私无知而宣告失败。”<sup>5</sup> 儿子马锐经历几次打击以后，只好接受“你是我爸爸，我是你儿子，别的想是什么也是不成”这一事实。小说描写了马林生这一类人物“无可奈何的精神困境”，<sup>6</sup> 并且透过这种描写，揭示了中国的父子关系中所蕴含的社会关系和文化基因，因而具有一定的文化意义。有人认为，“这部长篇的独特价值正在于此较为深厚的文化意义。”<sup>7</sup> 小说获上海长中篇小说优秀作品大奖的长篇小说三等奖。

王朔自己比较喜欢的是中篇小说《动物凶猛》（《收获》1991年第6期）。文革期间，一大群军队干部的孩子们失去管教而又无所事事，成天聚在一起吹牛、“拍”女人、打架，懵懵懂懂打发了青春。这伙当年的半大孩子，就是后来那些“顽主”们的前身，也许正是那个时代，促发了他们反抗社会的人生倾向。至此，王朔的创作已显得较为成熟。

除了小说之外，应当说，在中国大型室内电视连续剧的创作方面，王朔也是较有成就的。（虽然一年中四部小说被改编成电影使他暴得大名，但电影剧本中属于他的创作并不多。）1990年秋，王朔与郑万隆等作家共同创作的电视剧《渴望》推出。这是我国第一部大型室内电视连续剧。曲折动人的故事情节与剧中人物的坎坷遭际颇具吸引力，一时间，“渴望热”风靡了举国上下。但在《渴望》中，王朔的幽默、机智、调侃的特色并不十分明显。

真正充分显示王朔的艺术风格的电视剧，是1991年的《编辑部的故事》（与冯小刚、苏雷等人合作）。在《人间指南》编辑部里，青年编辑于冬宝、戈玲，和编辑部另几位同仁，共同串出一个个荒唐可笑而又发人深思的小故事。这些故事大多涉及当今生活的热门话题，特别嘲讽了许多不合理的社会现象，王朔式的幽默与调侃在此被发挥得淋漓尽致。此剧因此大受欢迎，继《渴望》之后再度引起轰动。

需要指出的是，在传播手段较为现代化的今天，电视剧无疑为王朔赢得了大量观众，是使王朔名声大振，能够轰动一时的重要因素之一。

## 二、“王朔现象”

一个作家的作品，以其与众不同的特色区别于他，并且在读者观众中产生较大影响，引起一定的轰动，有时就形成了一种文学现象。

80年代以来，以“现象”命名的事件越来越多，但各种现象似乎总是昙花一现，这也是人为“炮制”现象的必然结果。在诸种“现象”中，80年代中期以来一直被人赞扬、抨击、挖苦的王朔小说现象是个例外：近10年来他的小说不但走俏市井，而且在高雅的文学圈中、高知识阶层也不乏口碑，1988年的中国电影甚至被冠以“王朔年”，而1992年夏秋之交沸扬京城的《王朔文集》的出版更为“王朔热”加温。无论赞成与反对，王朔小说在新时期文学中拥有最多的读者已成为既定的事实，有他参与的影视作品收视率、上座率也居高不下。如果仅以“痞子文学”一而概之的话，恐怕难以解释王朔小说的走红。<sup>8</sup>

这是一位评论家对“王朔现象”的概述。

任何一种文学现象，都应当有其自身较为鲜明的特征，才能构成所谓现象。王朔现象当然也不例外。只是，王朔的创作较为复杂，本文仅以几点概括，恐怕难免失之偏颇。

### （1）、描写对象的特殊性

人们首先被王朔作品所震惊的，是他把一批几乎从未在文学作品中出现过的人物，一下子推到人们面前。描写对象的与众不同，既是区别于其他作家的显著标志，也是造成“王朔现象”的轰动效应的因素之一。

有人曾对此这样概括：“王朔小说几乎无例外地是写中国当代社会中一个特殊的青年阶层——‘痞子’”。<sup>9</sup>所谓“痞子”，是指这些人不仅没有受过较正规的文化教育，没有相对稳定的正当职业，而且以嘲弄世俗、蔑视既定道德准则的人生态度活跃于社会舞台。

除了“痞子说”之外，还有用“流氓”、“浪子”、“顽主”、“多余人”、“中国现代嬉皮士”等许多说法来称论王朔作品人物的。在诸多说法中，我更倾向于“边缘人”说。因为，认为王朔小说人物是“都市里的边缘人”<sup>10</sup>这一说法，更侧重于这一类人物的内在精神特征而不是只看他们的外在行动特征。所谓“边缘人”，是说这些人不能或不愿置身于社会现行规范和秩序中，他们的所作所

为与之发生尖锐冲突。他们尽情嘲弄现行秩序下的虚伪与荒唐，以玩世不恭的粗鄙与放纵对抗现存社会秩序；而同时，他们也无力代表一种新型的文化，无法进入社会文化的中心，更无力创造理想境界，只能在嘲弄生活的同时嘲弄自己，始终处于社会文化的“边缘”。

纵观中国当代文学四十余年，由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直接控制与影响，描写“工农兵”形象及歌颂正面人物，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一直是文学的主流。六十年代初期，文艺理论家邵荃麟曾经提出过“写中间人物论”，并引起了一连串的讨论，最终以此论遭批判而告结束，导致后来只能是“高大全”似的人物独自走在“金光大道”<sup>11</sup>上。也就是说，虽然正统的文艺理论一直张扬着“现实主义”的大旗，但实际上并非现实生活中的一切都能被表现，现实生活中的—切人物都能成为文学的表现对象。进入“新时期”，文学画廊中的人物形象变得丰富起来，并且经由了“英雄——普通人”的变化过程。随着对文学创作种种限制的逐渐摆脱，几乎不再有什么人不能成为被表现的对象。

尽管如此，当王朔把他的那些人物陆续推上台时，依然使人们大吃一惊。因为，他们既不是高大完美的英雄，也不是生活中的寻常百姓，而是这样一群不登大雅之堂的“都市的老鼠”<sup>12</sup>。早几年还几乎是完全不可思议的事情，王朔居然明目张胆地做了。特别是，他有意隐去作者的叙事人身份，大都采用第一人称“我”的口吻进行叙述。故事叙事人与小说主人公身份的混同，很容易让人们产生错觉，以为作者即作品中的“我”。以致于在对王朔的一片谴责声中，就有人将其作品称之为“痞子文学”、“流氓文学”的。实际上，作者也许正是通过小说主人公叙事角度的借用，以一种似乎不带批判性的态度，展示了这样一群以前不为人们所知的特殊人物的生活，从一个特定角度表现了当代社会生活的真实，才达到引人注目的效果，引起一定的轰动效应。并且，通过描写对象的特殊性，作者不动声色地撕破了某些正经面孔背后的虚伪，人们不难发现他对正统价值观念的挑战态度。

## （2）、创作态度的特殊性

“王朔现象”中，令很多人侧目而视的，不仅仅是他那些异乎寻常的小说人物，同时也包括作者标新立异的创作态度。

中国文学，发展到现、当代，不但继承了古代“文以载道”的传统，而且还有鲁迅“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的创作动机为楷模，文人作家们大都背负着沉重的责任感与使命感。特别是解放后共产党不断加强对文学艺术的控制，强调文艺

“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使得长期以来，人们一直以极为严肃、神圣的态度对待文学创作。作家如果不是出于救国救民、教育读者的动机，起码也是将“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个人认知提供给读者，或者是向人们展示自己对艺术的执着追求。人们习惯于将作家看作是“灵魂的工程师”，而作家也难免具有在精神上高人一等的“精英意识”。

人们完全没有料到，到了20世纪80年代，王朔居然可以以一种截然相反的姿态出现于文坛。他“绝对不自以为比读者高明（真诚、智慧、觉悟、爱心……），而且大体上并不相信世界上有什么太高明之物的作家和作品，不打算提出什么问题更不打算回答什么问题”<sup>13</sup>。他不仅不止一次地在作品中公开嘲弄作家，而且对自己的职业，他反复强调只是个“写字的”<sup>14</sup>。在王朔那里，人们找不到关于什么道理或人生哲理的说教，也看不出艺术家探索人生底蕴的艰涩与深奥。让人们“看一乐儿”，从阅读中得到轻松愉快的享受的娱乐性效果，是王朔十分自觉的主观追求，也是他的作品能赢得大量读者的重要原因。他曾经这样说过：“有人觉得不需要读者，这当然无所谓。但是对我来讲，我需要。我觉得小说还应当是小说，就还应当让人看，还需要那些和传统不能分割的若干因素。”<sup>15</sup>正是为了“让人看”，他把多年来人为地强加于文学的重负轻轻一抖，统统抛却，在作品本身的娱乐性上大做文章，使小说重新变成一种通俗有趣的读物。和中国多年来强行将文学捆绑于政治战车的做法相比，王朔的这种创作态度，应该说是一种文学的自我解放之举。对此，有人赞成，有人则指责他将文学引入“媚俗”的歧途。结论如何，也许要留待历史作出，但不管怎样，这确是“王朔现象”的一个十分鲜明突出的特征。

王朔看重作品娱乐性、“需要读者”的积极态度，既是他的主观追求，也有着文学创作体制上的客观因素。王朔以前（包括同时或以后）的大部分作家，享受着“大锅饭”、“铁交椅”的优越性，作家协会或专业创作人员编制的固定工资，使他们不必在“写出的东西有没有人看”的问题上煞费苦心，因而事实上造成了作家创作与读者消费严重脱节的现象。而王朔则不同。他是在辞去公职后才专门从事文学创作的，而且没有在任何一个作协组织里占一席之地。如果他的作品也写出来没有人看，卖不出去，那他“以文为生”的企图就只能宣告此路不通。客观情势逼得他必须把作品的可读性放在第一位来考虑，而文学创作，在此才实实在在成为一种谋生手段。王朔一反过去文人“耻于言利”的隐性心理，率先为自己的作品“开价”，并且率先创办大陆首家民间影视创作机构——海马影视创作室。与九十年代

商品经济大潮对中国社会的冲击相适应，王朔算是领风气之先，起步较早的一个。

### (3)、“轰动效应”

王朔一些有代表性的小说发表以后，开始赢得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的好感。1988年，四家电影制片厂先后不约而同地选中王朔小说改编成电影。而此时，整个电影界正处于不景气状态，王朔作品能独占风头，说明它们本身对观众来说，是很有吸引力的。王朔由此“红”了起来，并形成了第一次“王朔热”，也有人因此将1988年称为“王朔年”。

与电影相比，电视剧观众的范围要大得多。随着八十年代电视机的普及，电视剧越来越成为亿万中国人不可或缺的精神消费品。在王朔以前，能够受到普遍欢迎，使得雅俗共赏的电视剧作品还不是太多，特别是大型室内电视连续剧。王朔捷足先登，和其伙伴们一口气搞出了《渴望》、《编辑部的故事》、《爱你没商量》等几部大作品。“这几部电视剧，无论是形式（室内剧）还是长度（多达几十集），在国内都属首创，并且皆由最具权威、收视率最高的中央电视台在黄金时间内首播或重播，获得了极高的大众传播效益。从而，本已令人关注的王朔更加引人注目，原本十分燥热的‘王朔现象’更加红火。一时间，王朔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这几部电视剧成了人们茶余饭后街谈巷议的热门话题。”<sup>16</sup>

王朔的创作促进了中国当代电影与电视的繁荣与发展，电影电视又为王朔带来极大声誉，这是“王朔现象”的一个重要特点。同时，王朔小说的发行与销售，在出版界总体不景气的背景下，也较为可观。就目前所知，约有《空中小姐》、《我是你爸爸》、《玩的就是心跳》、《过把瘾就死》、《火欲一警官单立人的故事》、《王朔文集》、以及《王朔谐趣小说》等数种书目出版，其中不少种印数都达几万册。此外，还有王朔谈创作的《我是王朔》。王朔的这些书，不少都是通过“第二渠道”即个体书摊发行，销售渠道十分畅通。

## 第二章、“王朔现象”与文学评论界

### 一、文学评论界对“王朔现象”的反应

时至1993年，当有人对“王朔现象”稍作回顾时，有这样的发现：

那就是从王朔的开始引人注目乃至到他后来变得大红大紫，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评论界似乎在有意无意之中冷淡王朔。

早在一九八四年的《当代》第二期上，王朔就发表了他的中篇小说《空中小姐》，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随后，他便一发而不可收拾。（中略）同时，他还倍受电影电视的青睐，仅在一九八八年他的作品被搬上银幕就达四部之多，并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强烈的反响，标示了一颗文学新星的升起，“王朔热”此时已悄然兴起。然而，在评论界，几乎是一片沉寂，人们对此不约而同地保持缄默。直到以卖书为生的个体户们将王朔摆满书摊，千家万户端坐电视机前为刘慧芳（电视剧《渴望》女主人公）的命运一洒同情之泪，街头巷尾津津乐道于“编辑部的故事”之时，评论家们才再也不能无视王朔的存在，终于对王朔这一现象加以评说，渐渐地关于王朔的文章开始多了起来。而此时已是一九八九年。在此之前，几乎没有一家大型评论刊物登载过评论王朔及其作品的文章，即使是王朔红得发紫的时候，他始终也没有成为职业评论家的热门话题。17

上述说法基本上符合事实，但有一点例外。就笔者目前搜集到的资料看，载于1986年第11期《青年文学》的《徘徊在人与非人之间的灵魂——评〈橡皮人〉》，是较早一篇评论王朔的文章。作者曾镇南，是文学界颇有影响的一位评论家（著有《王蒙论》等专著），他不怀偏见地分析了《橡皮人》及王朔的创作，并给予较高评价。他这种坦诚的态度，在整个评论界较为鲜见。

另一篇文章的作者也说：“作者翻阅了有关资料，发现对王朔进行批评的占绝大多数，而表示赞同的很少，且多是采用含蓄、隐晦的笔法。”18

总体说起来，评论界对王朔的反映，一是普遍较为冷淡，二是大多持保留态度，批评的多，赞扬的少。有人认为，“显然，一度对王朔批评的缺席，并不是评论家们的疏漏，而是另有其深刻原因的。”并且将这原因归纳为：“评论家对王朔的态度，与对通俗文学的偏见不无关系。”19 笔者则认为，个中原因，较为复杂，大约可以归纳为如下几点：

#### ① 评论界的思维定势

对于中国的文学评论界说来，评价文学作品的好坏高低，似乎存在着一定的模式。符合这个模式的就是好的，反之就是不好的。以前，这一模式的内涵，大致被约定在政治标准范围内，“文学艺术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准绳，束缚了人们达几十年之久（从延安文艺座谈会算起）。八十年代后，政治标准的因素逐渐开始淡化，说法有所不同，比如，社会主义文艺“要通过有血有肉、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真实地反映丰富的社会生活，反映人们在各种社会关系中的本质，表现时代



前进的要求和历史发展的趋势，并且努力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人民，给他们以积极进取、奋发图强的精神”；20 和政治家的要求不同，职业评论家则认为：“它正是我们从直觉上把握生存境遇的基本方式，是每个人达到精神的自由状态的基本途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文学自有它不可亵渎的神圣性，尤其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就更成为我们发展自己精神生活的主要方式了。”“文学应该帮助人强化和发展对生活的感应能力”<sup>21</sup>。说法虽不相同，核心意思却大致相近。即强调文学的教育功能或“启发”、“鼓舞”作用，而对其反映和暴露现实，特别是对现实中阴暗面的揭示功能和文学的娱乐功能，仍然有所忽视。

除了评价作品时内容方面的思维定势外，还存在着方法上的陈规。虽然“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多年前就开始提倡，不仅当时的提倡者毛泽东并非出于真心，只是作为想要镇压知识分子时“引蛇出洞”的一种权术；即使是文革结束、“拨乱反正”之后，文学界内部本身，也并没有能够形成对各种不同作品兼收并蓄的宽容与大度。排斥异己的恶习依然存在。

在这种情况下，王朔受到冷遇就是很自然的了。因为，王朔的作品，显然是不符合人们关于文学的标准的，但轻易地表示愤怒或不满，又可能会有失分寸，于是，保持沉默就成了大多数评论家一种较为“明智”的选择。

## ②“雅”“俗”之见

在这个问题上，现在的评论家们，不仅继承了前人“重雅轻俗”的传统，而且固执于一些人为制造的概念，如“精英文学”、“严肃文学”、“纯文学”之类，而排斥相对的“大众文学”、“通俗文学”、“俗文学”等。“雅、俗之争”，由来已久，“新时期”后期曾引起较为广泛的注意，本文在后章将做具体论述。

王朔的作品一出现，就跟人们看惯了的纯文学作品不太一样，虽然它们大多发表在纯文学杂志上（如《当代》、《收获》之类艺术品位较高的杂志）。“评论界一度对王朔的疏远，从侧面可以说明，人们一开始便在潜意识之中将王朔划入通俗作家的队伍之中。”<sup>22</sup>于是，依照成见，有些人对王朔不屑一顾，潜意识中是担心对此类作品轻易置喙会有失身份；有些人则按捺不住愤怒，“痞子文学”、

“流氓文学”的说法纷纷出台。而实际上，评论界对王朔的冷漠与批评，与读者观众对王朔的喜爱与欢迎，恰好形成鲜明对比。对此，曾经有人发出“评论者为什么总和千千万万读者过不去？”<sup>23</sup>的质问。

## ③王朔的“恶作剧”

依我的看法，评论界对王朔的冷漠，还有一个不太便于明说的原因，那就是出

于王朔的“恶作剧”。王朔因为厌恶以前的种种教化，在作品中，常常表现出一种明显的“仇智心理”。他不仅公开将作家称之为流氓：“你没听说现在管流氓不叫流氓叫作家了吗？”（《顽主》，华艺出版社1992年版《王朔文集》卷4第44页，以下凡引自《王朔文集》者只注卷数和页数。）而且不止一次地在作品中对评论家的惯用语言大肆嘲讽。如下面一段：

“几十年来，我们是怎么取得一个个成就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那就是始终如一坚持玩文学的创作方针。”……

“我建议同学们重新学习古今中外文学史和文艺理论，写的多么清楚多么明白。不玩文学的人是没有出路的。从那时到现在，形势并没有起很大变化么，不是喊文学要走向世界么，不玩文学，诺贝尔文学奖会发给中国人？”

……

“看看我国现代文学宝库中的经典之作大师之作，哪一篇不是在玩文学？要有社会责任感么！我们是作家，作家是什么人？那就是人上人！总是比一般人机灵点高雅点背负着民族的希望充当着社会的良心指点着国家的未来。我们要不站在高处指手划脚品头论足上挂下连左右方向那全国人民是进退维谷不知所措求生不得欲死不能——那还不得活活憋死！”（《一点正经没有》，卷4第112-114页）

除了“玩文学”是王朔的“创造”，许多地方都是他对自以为是、高居人上的评论文章语言的戏谑性模仿。他这种令人哭笑不得的恶作剧，使得即使是对他心无成见的人们，恐怕也难以贸然开口，去赞扬一个对自己的职业大肆嘲讽的家伙。可以说，是王朔自己不加掩饰的挑衅态度，从一定程度上使得评论家们不得不对他采取小心翼翼的谨慎态度。

## 二、评论界对王朔的主要分歧点

王朔是当今文坛上引起争议较多的一位作家。争议大致集中于下几方面：

### （1）、对作品中人物的评价

对王朔作品的分歧意见，首先表现在对他的人物评价上。

持批评态度的有的说得很直接：“典型的王朔作品的人物主要是‘痞子’，有些干脆就是‘流氓’。”“王朔的主人公没有未来。他们年纪轻轻却老气横秋，他们鄙视、嘲讽一切天真、诚实、质朴的事物，鄙视、嘲讽一切原创性，即一切与生

命有关的东西，这里所传达的是一种精神上的衰老。在他们的机智和狡黠背后，散发出一股腐朽的气息——这是一些口若悬河、滔滔不绝的尸体，是社会机体上的坏死的部分。”<sup>24</sup>

黄式宪在评论王朔电影的文章认为：“不必讳言，王朔电影里的主人公，与现存的社会秩序具有深刻的不和谐性，属于反叛文化却不参预建设的颓废的一代。”说《顽主》中的人物“大抵都带有某种逢场作戏或‘助纣为虐’的游戏色彩，实际上是以戏谑人生的超然，陷于从作践他人到作践自我人格的恶性循环而难以自拔。”<sup>25</sup>

而陈晓明则认为：“王朔的主角们在社会中没有确定的位置，他们既怀着不能进入的嫉恨，又带着逃避的蔑视，因而他们被注定是‘边缘人’。”“作为一群‘边缘人’，王朔的主角大多数是防御性的个人，他们与现行规范和秩序确实不协调，甚至存在某种程度的对立，但是，他们拒绝外部世界主要是维护‘真人’品格。因此，他们对既定的价值规范的破坏不是通过那些激烈的反抗行动，而是以对生活的‘不完整性’认同的嘲弄方式来抵御外部世界的支配力量。……于是，王朔的个人总是充当了否定外部规范的抵押品——通过嘲弄自我来嘲弄现实，从而消解社会的统一价值规范。”<sup>26</sup>

评价作品中的人物，仅仅凭着评论家的主观好恶，很容易形成评价上的倾斜。而注重人物与社会环境间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可以避免主观偏见。在上面所引两篇电影评论文章中，显然后一篇的看法更为符合客观一些。

另一篇文章也注意到此点。“在王朔的小说中，顽主更具突出的地位和意义。可以说他们是特定的社会和时代潮汐荡涤出的产儿，是王朔为当代文学提供的前所未见或少有的‘新人’形象。顽主的脱颖而出，给一个熟透的社会和早熟的人注入一种新鲜的朝气和生机。他们象一群儿童，调皮、任性、自然、真诚。这正是久已被压抑的‘社会人’丧失的最宝贵的品性。……他们的恣意妄为随时都在向时代和社会提出挑战和反抗，构成一种纷纭复杂的景观，令人颇为费解。”“对传统价值观和传统文化的重新审视、评价、确认，是一股不可阻遏的潮流。正是这个时代的复杂矛盾把他们推向茫然的海洋，推向传统惰性和现代文明的夹缝中，搏斗、挣扎、惶惑、迷惘，以至于畸形扭曲。时代和社会使他们经受了风雨和波澜，冲击和摔打，却并未将他们锻造成熟。顽主对传统文化和社会规范的冲击反叛，并非是一种自觉的意识，而是出于挣脱束缚，寻求自由的本能。由于成长在一个无序、混乱的时代环境，他们对传统文化及价值观接受少、承继少，反叛就强烈坚决。”<sup>27</sup>

在对王朔的人物进行评价时，一些评论家不觉中就陷入一种道德批判。而文学作品中的人物与现实生活中的人物显然是不同的，仅用道德标准去衡量，就显得说服力不够充分。何况有些道德标准，本身正确与否还值得推敲。相比之下，那种从人物与社会的关系的角度切入，充分理解变化中的社会现实下人的生存困境，并由此分析人物特征的方法，比仅仅把王朔的人物斥之为“痞子”、“流氓”的简单化的作法，我认为更有说服力一些。

## （2）、对王朔作品价值的评价

对王朔作品价值的总体评价，高低悬殊很大，这也是王朔的特殊之处。

1993年2月，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一群青年学者（包括教授和博士生、硕士生）讨论“文学和人文精神的危机”问题时，就把王朔作为一个反面典型：

调侃恰恰是取消生存的任何严肃性，将人生化为轻松的一笑，它的背后是一种无奈和无谓。王朔笔下正是充满了调侃，他调侃大众的虚伪，也调侃人生的价值和严肃性，最后更干脆调侃一切。……调侃者一如看客，他置身于人生的局外，既不肯定什么，也不否定什么，只图一时的轻松和快意。调侃的态度冲淡了生存的严肃性和严酷性。它取消了生命的批判意识，不承担任何东西，无论是欢乐还是痛苦，并且，还把承担本身化为笑料加以嘲弄。这只能算作是一种卑下和孱弱的生命表征。王朔正是以这种调侃的姿态，迎合了大众的看客心理，正如走江湖者的卖弄噱头。

这当中也包括了迎合大众想发牢骚，想骂娘的心理，大众也因此或得了—种宣泄怨愤的快感。

王朔以这种方式博得了大众的青睞。在调侃中，人们通过遗忘和取消自身生命的方式来逃避对生存重负的承担。然而，现实生存并不因这种逃避而有丝毫改变。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国人生存境况之不堪和生命力的孱弱。不然，人们何以像抓救命稻草似的乞灵于这一点点可怜而又无聊的“轻松”呢？28 这是一群典型的孤芳自赏的“学院式”学者。不仅全面否定了王朔作品价值，还捎带着连大众一起加以攻击。这种批评态度在整个评论界很有代表性。

前面曾举过的黄式宪的文章则认为：

作家艺术家不应在“无主潮”的掩饰降低自己作品的文化品位，特别处在文化滑入“低谷”的艰窘时期则需要发挥艺术家的主体性以及—在创作

实践中艺术的构造力量。王朔电影里所缺的，我认为，主要正是这种艺术的构造力量。在艺术形象的刻画上则流于一种消极的媚俗、浮躁之态。

在王朔的电影里，创作者仿佛陷于现实的一片洼地却颇以为自满自得，赤裸裸地描写城市改革进程中某些与商品这个怪物共存共荣的负面性人际关系以及犯罪活动，……于是，任何严肃的意识形态剖析和审视，俱都遭到排斥和消解，何处去寻觅艺术美及其构造的力量呢？！29

还有一位评论家这样说：

“痞子”是以社会的正义、道德、法律为对立物的存在物。王朔小说把他们受到极度压抑的社会潜意识揭示出来，作为人格舒展的‘正常人’描写出来，这种写作本身就是对正义、道德和法律的蔑视，并以所谓的人性的还原构成了对市井文化传统的反抗。王朔小说的这一极端的文化视角所形成的冲击波是惊世骇俗的：它在为“痞子”的真实存在和存在的真实而由衷叹喟，它要为“痞子”的人性价值树碑立传。而这样做的结果却是对社会的纯洁、真诚的背叛。在王朔的小说中，已无所谓崇高正义使命可言。30

上述这些意见，代表了对王朔的创作持批评态度的看法。归纳起来看，持批评态度的评论家们，认为王朔艺术创作的格调不高，缺乏艺术家应有的对生命与存在的严肃态度与艺术的感召力，而不过是低级庸俗的“媚俗”与无聊的发泄，没有太高的艺术价值。这些批评者们共同地执着于一些理念性的东西，如“社会的纯洁、真诚”，“崇高正义使命”等，而对王朔所揭示的社会现实，却有意无意地不予注意。

另外一些评论家，对王朔作品则持与上述态度完全相反的看法。

王朔既绘形绘色地描写了顽主生活的恣意放纵和自由舒展，又深刻表现了他们精神的忧郁和苦闷。无论描写前者是多么快慰，描写后者是多么沮丧，作为一个客观的作者，王朔再现了顽主的生活和现实状态，显示了现实主义的力量和作者忠于生活的创作态度。……

王朔小说有独特的认识价值和批判力量。他描写了鲜为人知至少是一部分人还不太熟悉的生活和人物。王朔的作品会使我们得到近乎全新的生命体验、情感体验和审美体验。他领着我们重新领略了转型期社会的激荡、碰撞和现代都市斑驳陆离、眼花缭乱的生活色彩，以及人生现世的纯洁、善良和姣美，更多地是荒唐、调侃、虚伪、暴力、色情和无耻。他对生活的洞察、感受；穿透和表现，使小说真正具有认识价值。顽主及其生活是毋庸置疑的

客观存在，它的出现有广泛的社会背景，具有某种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合理性，顾主身上甚至闪烁着非常宝贵的亮色，但自身又存在消极因素和破坏力量，集中了一半天使、一半魔鬼的善恶，他们即将超越旧事物的窠臼，但尚未跨上新世纪的台阶，是一种不容忽视的社会现象和社会力量。其独特之处就在他们不同于中国文学史中其他形象，这是王朔的成功所在，他使顾主在中国当代文学艺术画廊中占有一定位置。……

王朔那种近乎巴尔扎克式的真实又蕴含着潜在的批判力量，在读者面前，顾主生活本身完成了自身诸多方面的无情否定。这就是顾主和王朔作品给予人们的启示和警醒。坦率地表现和承认顾主包括自己的脆弱而不怕嘲笑，体现出王朔作为小说家的勇气和真诚。 3 1

这是从作品人物的两面性（或多面性）及其产生根源的分析角度，肯定了王朔作品的价值，特别是它们的认识价值。

而到目前为止，青年学者曹文轩在《中国八十年代文学现象研究》一书中，给予王朔的评价，可以算是比较高的：

你也许不是一个哲学家，但你的作品却含有连职业哲学家都不能达到的哲学深度。你作品中的人物，他们各自代表着一种哲学。他们中间的一个如果毁灭了的话，也是一种哲学的归寂。 3 2

对于一种轰动一时的文学现象，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其价值作出各自不同的判断，本来是很正常的。而王朔能引起高低悬殊如此之大的分歧，令人不得不考虑到其中蕴含的内外多重因素。所谓内部因素，即王朔创作本身所包含的不同审美价值，比如对社会现实的认识功能，使人轻松愉快的愉悦功能等；而外部因素，则不仅与时代的发展变化有关，且如前所述，与评论界的思维方式与习惯，或者说批评的标准问题，也有很大关系。批评王朔的人们，常常从某种既定概念出发；而肯定王朔作品价值的人，大都基于作品实际，特别是其中所反映的社会现实，和其深受欢迎的事实，从而得出不同的结论。

### （3）、对王朔创作态度的评价

在此问题上，也曾有过不少意见分歧。这里，只想举两个有趣的例子。

一是1993年，在1月30日的《中国青年报》上，登载了一篇署名“老愚”的文章，题为《一只色彩斑斓的毒蜘蛛》。文章说：

王朔作品的魅力，在于他玩味调侃一切所谓神圣的东西，于捉襟见肘中

或得某种优越的享受，说穿了，王朔作品乃是过度自卑的产物，是一个人想出人头地而又无法通过正当途径叩门而入者的精神胜利法，是当代的阿Q。虚伪的道德、内里中空理想固然应该予以嘲讽，但仅有嘲讽是不够的。况且王朔式的嘲讽是泼皮无赖式的，是一个无力改变自身命运的弱者的诅咒，一个疯狂破坏的力比多分子。基于建设的任何毁坏都值得尊敬，但王朔不是，他是一个不甘寂寞的玩世者，一个世纪末的恶作剧者。

此文发表后，引起一场轩然大波。读者纷纷写文章或打电话给报社，表达各种不同意见。《中国青年报》由此展开题为“王朔给我们带来了什么？”的专题讨论，据云“收到了全国各地数百封来信，话题之广泛，论争之激烈，在日趋疲惫的文坛上当属奇迹。”<sup>33</sup>北京的作家、评论家们也加入了讨论。总体看来，此时对王朔的评价特别是对其创作态度的评价，虽然仍是“两极分化”，持肯定意见的已经占了多数。

几乎与此同时，在知识分子中颇有人缘的杂志《读书》（1993年第1期）上，发表了王蒙的文章：《躲避崇高》。王蒙在文章开头，列举了现、当代文学史上，作家们的各种创作态度，接着讲到王朔：

王朔等一些人有意识地与那种“高于生活”的文学、教师和志士的文学或者绅士与淑女的文学拉开距离，他们反感于那种随着风向改变、一忽儿这样一忽儿那样的诈诈唬唬，哭哭啼啼，装腔作势，危言耸听。他不相信那些一忽儿这样说一忽儿那样说的高调大话。他厌恶激情、狂热、执着、悲愤的装神弄鬼。……

他和他的伙伴们的“玩文学”，恰恰是对横眉立目、高踞人上的救世文学的一种反动。

王蒙在文艺界，以其前文化部长的身份，说话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他的这一说法，应该说是比较客观、公允的。此后的《读书》上，又陆续有过两篇表示不同意见的文章。

### 第三章、“王朔现象”产生原因

“王朔现象”在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坛上能够乍起还“红”，有着多方面的复杂原因。我认为主要是社会政治的、文学发展演变等因素所致。

## 一、政治生活与社会环境的因素

### 1、八十年代的政治

从整个人类社会这一大范围看，进入当代社会后，如中国一样将文学与政治紧紧绑在一起的情况，在世界上还不是太多（前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则与中国相似），因此，讨论任何一种当代中国的文学现象，都不应忽视其与中国政治的关系。

八十年代的政治，有哪些特点呢？

一方面，是走出十年动乱的阴影，急速走向“改革开放”，并且也确实有一些“拨乱反正”的动作；但同时，“改革开放”始终限于经济领域，政治上一直强调“四个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等原则，因此不断地有“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清除精神污染”等行动。而在这些动作中，文学艺术往往首当其冲，成为被批判的对象，不断有作家成为牺牲者。甚至九十年代，还有围绕着王蒙小说《坚硬的稀粥》的一场官司，也还有电影在国外得奖国内却禁止上映的情况发生。这说明，即使是在八十年代，中国的“党政治”也没有完全放松对文学艺术的控制，对文学艺术的发展有着或轻或重的影响。

另一方面，中国毕竟是要搞改革开放，发展经济，国计民生，千头万绪，相比之下，区区文艺，就显得微不足道了。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有谁想要有效地掌握或者控制文艺，不是力不从心，就是显得不合时宜。因此，具体体现在文艺政策上，就呈现出时紧时松的特点。

正是这种“时紧时松”的文艺政策，是使王朔现象得以应运而生的一个重要因素。如若是早几年，王朔的作品很可能遭到批判。即使是现在，也还有“时而传出对王朔及王朔现象的批判已经列入大批判选题规划、某占有权威地位的报刊规定不准在版面上出现他的名字、某杂志被指示不可发表他的作品的消息”<sup>34</sup>情况。而王朔以他的机智，也非常适应了这种政治形势。正如王蒙所说，他“十分机智，敢砍感抡，而又适当搂着——不往枪口上碰。他写了许多小人物的艰难困苦，却又都嘻嘻哈哈，鬼精鬼灵，自得其乐，基本上还是良民。他开了一些大话空话的玩笑，但他基本不写任何大人物，……他们的一些话相当尖锐却又浅尝辄止，刚挨边即闪过滑过，不搞聚焦，更不搞钻牛角。有刺刀之锋利却决不见红。”<sup>35</sup>这就使得那些出于政治的原因对他不满的人，即使十分恼火却也无可奈何。“讷而不虐”，是王朔得以适应中国当代政治的一个护身法宝。



## 2、社会环境的变化

“80年代后半期，改革开放初见成效并以空前的速度向前推进，经济成为中国社会现实中的核心命题，商品化大潮汹涌而至。商品经济的发展必然改变人们的生存条件及以此生存条件为基础建立的‘想象关系’。”<sup>36</sup>

我个人认为，80年代商品经济大潮对中国社会的冲击，是几十年来最为深刻的一次，甚至超过“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不过是把共产党几十年来的“极左”路线发展到登峰造极的程度，而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则在深处改变着人们习惯了多年的生活和与之相适应的种种思想观念。于是，一方面，是不同于以往在社会生活中占据主要地位的“工农兵学商”以外的人物开始出现并越来越活跃（如王朔笔下的那些人物），另一方面，是正统的价值观念受到严重挑战。人们对急剧变化的社会环境一时感到无所适从，加上对政治改革的失望，普遍存在着不满情绪。社会生活的深刻变化，使得王朔能够将与以往完全不同的人物领入文学的舞台，充分展示他们的生活与精神世界，并通过他们，对正统价值观念进行了无情的嘲讽与调侃。

商品经济带来的冲击，是从物质到精神，全方位全方面的。它不仅为王朔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表现对象，而且提供了传播手段。有人在分析“王朔现象”产生原因时，注意到这一点。

真正使其大红大紫波及全国的则是依靠另一种商业手段、一个捷径——与影视联姻。王朔等人于影视界频繁地接触是在1989年左右。这时候王朔在文学界的发展基本达到了饱和的程度，他逐渐发现了他自己的作品作为文学的影响困境：虽然他的情趣与审美口味是属于市民阶层的，但在这阶层里却没有几个愿意去读他的小说。因此他“别无选择”地选择了影视尤其是电视作为突破口。

目前大陆拥有电视大约1亿台左右，电视收看人口逾8亿，电视作为一种最佳的传播媒介深入各个家庭，与吃穿住玩一样，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一项不可缺少的内容，“王朔现象”之所以产生，很大的功劳是靠电视的广泛传播。<sup>37</sup>

## 二、文学演进变化的因素

与中国政治社会生活的变化相应，始于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新时期文学”，也随之发生了种种变化。而这变化，同时又是中国社会一步步发展历程的忠

实记录。

回顾新时期文学发展主流，大致由“伤痕文学”开始，经历了“反思文学”、“寻根文学”等几个阶段，到1985年，进入一个转折点。在此之前，几乎每一种命题的文学，都反映和表现了彼时人们关心的社会问题，因而也都曾引起一时的社会兴趣，产生过一定的轰动效应。此后，如前所述，一方面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社会生活的变化，人们的兴趣中心有所转移，另一方面，从“寻根文学”以后，作家们的创作呈现追求精深高雅的趋势，对社会问题的思考逐渐转向文化的层次，也使得文学越来越脱离大众，远离现实生活，失去读者，开始“走向低谷”。

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走向低谷”却也正是一个契机，它使人们可以从多年“轰动效应”的热情中冷却下来，对文学的功能和意义进行重新认识。比如对“通俗文学”或文学的“通俗化”问题的讨论，就是从这时开始的。如有一位评论家这样说：“从根本的方面看，通俗文学的诞生适应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是商业文化兴起，市民阶层活跃的诸多后果之一。解放前，象张恨水、张资平、张爱玲这样的作家，都曾是写通俗小说的高手。解放后，文学一度强调党性原则，强调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高雅的作家才对通俗小说鄙夷不屑，通俗文学也才由于非文学的原因而被长期窒息。如果说近几年通俗文学的复苏是它本身冲破禁锢的结果，那么它的崛起于文学结束历史反省之际，它的畸形繁荣，就不能不和社会生活走向世俗化联系起来，可以说，通俗文学在新时期文学中扮演了这样一个角色：它代替严肃文学体现出作家们一时不愿正视的文学发展规律，反过来又使他们从它的畸形繁荣中意识到自己正受到这一规律的嘲弄与惩罚，从而由迷失的歧路中回过头来。”<sup>38</sup>

80年代后半期开始，讨论“通俗文学”的文章开始出现，并逐渐多了起来。1988年10月，首次全国通俗文学座谈会在广西召开。作家兼文化部长的王蒙和一些有名的作家、评论家参加了会议。会议对通俗文学的各方面问题展开了讨论，并且提出应消除对通俗文学的偏见，正视通俗文学价值等意见。因为这是建国以来第一次，会议本身就是一个文学转向的标志或信号。

早在评论家们就文学的通俗化问题展开各种讨论之前，已经有一些作家开始偏离“纯文学”、“精英文学”的主流，另寻发展途径。虽然和所谓的“通俗文学”还不完全相同，但文学创作中，注重一般市民的生活与兴趣的“世俗化倾向”，已经越来越明显。正是在文学潮流的这种演进变化过程中，王朔脱颖而出，以他独树一帜的创作，赢得大批读者，有力地冲击了已经了无生机的文坛，形成新的“轰动”。所以，“王朔现象”的产生，虽然事出文艺圈子内“精英”评论家们的意料

之外，实在是文学发展之势所必然。

以上，是仅就“王朔现象”抛出一些粗浅之见。“现象”毕竟是表面的东西，它的意义往往在于使人们通过它，去发现其后隐藏的更为重要的内容。而这后一步的工作，其实才是更困难因而也更具价值的。我希望以此为起点，和对此有兴趣的人们一道，向那更有意义的工作，做出共同的努力。

注：

- 1 阳雨《文学：失却轰动效应以后》，《文艺报》1988、1、30
- 2 初为原国家领导人赵紫阳所说，意即总体情况不明，前途亦不明，走一步算一步。后被广泛引用。
- 3 如杨春时《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王朔热”》（《文汇报》1992、12、21）王晓明等《旷野上的废墟》（《上海文学》1993、6）、刘洪涛《失衡的文化现象》（《文汇报》1994、1、17）等。
- 4 转引自《青春无悔—王朔电影作品选》P394。
- 5 唐小兵《在黑暗闸门的后面》，《读书》1992年第8期。
- 6 张德祥《王朔的小说方式及其他》，《当代作家评论》1993年第3期。
- 7 潘凯雄《走出轮回了吗？—由几位青年作家的长篇新作所引发的思考》《当代作家评论》1992年第2期。
- 8 李扬《褻读与逍遥：小说境况一种—王朔小说剖析》，《当代作家评论》1993年第3期。
- 9 邵牧君《王朔电影热缘何而起》，《中国电影报》1989、3、25
- 10 陈晓明《倾斜与补偿：王朔电影的都市二重奏》《光明日报》1989、11、9
- 11 作家浩然的小说主人公名和作品名，后为完美无缺的文学人物形象及正确路线代名词。
- 12 王平《王朔的恶作剧》，《文学自由谈》1989年第4期。
- 13 王蒙《躲避崇高》，《读书》1993年第1期。
- 14 《王朔自白》，《文艺争鸣》1993年第2期。引自孙鸣夏《由“王朔现象”想起的一兼及文学评论中的“防弊”之弊》，《合肥教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3期。
- 15 王朔《我的小说》，《人民文学》1989年第3期。
- 16 王东成《王朔的“媚俗”与“反智”》，《中国青年研究》1993年第3期。
- 17 张晓雄《王朔小说评论述评》，《湖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5期。
- 18 孙鸣夏《由“王朔现象”想起的一兼及文学评论中的“防弊”之弊》，《合肥教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3期。

- 19 同注17.
- 20 《邓小平论文艺》第6页,引自金圣《‘玩文学’的实质及其危害》,《光明日报》1990、8、5
- 21 王晓明等《旷野上的废墟》,《上海文学》1993年第6期.
- 22 同注17.
- 23 臧宇平《堵上他的嘴巴》,《王朔:痞子还是大师》北京燕山出版社,1993P37.
- 24 语冰《王朔、亚文化及其他》,《文艺理论与批评》1992年第6期.
- 25 黄式宪《王朔电影的文化构型及其负面值》,《光明日报》1989、11、2
- 26 陈晓明《倾斜与补偿:王朔电影的都市二重奏》,《光明日报》1989、11、9
- 27 常清华《论王朔的“顽主世界”》,《郑州大学学报:哲社版》,1991年第3期.
- 28 王晓明等《旷野上的废墟》,《上海文学》1993年第6期.
- 29 黄式宪《王朔电影的文化构型及其负面值》,《光明日报》1989、11、2
- 30 戴阿宝《超然与入世—王朔小说的远点透视》,《文艺理论与批评》1993年第1期.
- 31 常清华《论王朔的“顽主世界”》,《郑州大学学报:哲社版》1991年第3期.
- 32 转引自王敏《自我实现中的创痛与超越—观王朔的几篇小说》,《理论学刊》1989年第5期.
- 33 《王朔:痞子还是大师》北京燕山出版社,1993,P246.
- 34 王蒙《躲避崇高》,《读书》1993年第1期.
- 35 同上.
- 36 陈虹《市井的狂欢—王朔的故事和精英文化的窘境》,《文艺评论》1993年第1期.
- 37 彭云《试论“王朔现象”》,《沈阳师范学院学报(科社版)》1994年第1期
- 38 颜纯钧《文学的世俗化倾向》,《文学评论》1989年第1期.